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聯蘇

著 柏 爾 哈
譯 建 曹 復 馬

主編者
王 雲
韋 翹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聯蘇

著 柏 爾 哈
譯 建 曹 復 馬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懋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初版

(34182)

公民教育叢書 蘇聯公民教育一冊

Civic Training in Soviet Russia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馬曹王 Samuel Northrup Harper

譯述者

復建五雲

主編者

王雲 韋 愨

發行人

王雲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 E五五八七

鏤

譯者序

最近二十年來，世界上最堪注意的國家，就是我們西北的鄰國——蘇聯。這個國家曾於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以其驚天動地的大革命與綿延四年之久的國內戰爭，使全世界人士萬目炯炯地注意她的大破壞。但自一九二一年百業凋敝的最低點至一九二六年，僅在五年的短短期間，她的經濟狀況竟能恢復到戰前水準；隨後更於一九二八年開始實施五年計劃，改造全國的生產機構，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爲目的。她的大建設便從此震驚全球。過去以破壞相垢病者，現在均一變其向來的態度，稱頌該國經濟的發展，爭相倣效。各國人士對蘇聯建設的成功，初甚懷疑，繼而半信半疑，終而至於信其真實，且潛心研究，欲明其成功的原因，以作他山之助。美國哈爾伯教授 (Samuel N. Harper) 以客觀的科學方法，並作實地的探訪，著此『蘇聯公民教育』一書，實爲研究蘇聯者闢了一條捷徑。因爲蘇聯建設之所以成功的主因，不在物力，而在人力；人力的增進與利用，則全恃公民訓練的得法。

一九二九年爲本書初版的時候。從這一年起，世界其他各國均先後陷入經濟恐慌的旋渦中；蘇聯卻在此時非但沒有不景氣的現象，而且日趨繁榮。該國的計劃經濟正在這時候表現其獨異的優點，人民的情緒也非常興

提出以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口號。這口號終於一九三二年實現。一九三三年，該國政府繼續實施更繁重的第二屆五年計劃，以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及消滅階級和人與人間的剝削關係爲其正鵠。據最近塔斯社消息，這第二屆五年計劃已於今年四月一日實現，即較原定計劃早九個月完成，且第三屆五年計劃亦將於今年七月一日以前擬定。多數重要生產部門將於今年年底超過原定的計劃。重工業已於一九三六年完成五年計劃的百分之九八·三。同年，棉花的收穫則已大量超過五年計劃，而鐵道方面的五年計劃亦已全部超過。這種驚人的成績，已使蘇聯能在十年之內從工業落後的農業國一躍而爲最先進的工業國，其工業生產量已居歐洲首位，而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這種突飛猛進的現象，決非偶然。因爲「公民」二字在蘇聯有特殊的了解，並因此公民訓練的方法亦有其獨到之處。這對於該國的經濟發展，影響至鉅。

哈爾伯教授在本書第一章即已扼要地說明：正在組織，訓練，與教育中的蘇聯公民是「從事生產的公民」(the citizen in production)，蘇維埃的選舉制度，亦不像其他各國按照區域原則，而是按照生產原則，人民必須以某種工作人員的資格，於其工作所在地選舉職業代表。不生產者就沒有公民的資格，同時失卻一切公民的權利。這種公民觀念，確如哈氏所說，應於閱讀本書時「牢牢記在心中。」

『生產』二字，涵義十分廣泛。這不僅專指工業的生產或農業的生產而言，凡對於社會有益的勞動均得稱爲生產。譬如在各機關服務的職員，他們的服務工作就是他們的生產。服務成績的好壞，就是他們生產成績的好

壞。學校的生產工作，就是教學的工作：教員的生產是授課，學生的生產便是學習。學校每學期中每一週都有預定的教學進程，視此教學進程爲學校的生產計劃，與工業或農業的生產計劃作同樣看待。其他一切教育的、文化的、與甚至政治的機關都是如此，經濟的機關更不必說。故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即指能作社會有益的勞動而非遊手好閒與剝削他人勞動的任何行業的人民。蘇聯以此種人民爲其合格的公民，足見其如何注重生產事業。這與其他各國一般的公民觀念絕不相同的。

雖是這樣一般地重視社會生產，但蘇聯政府與民衆對於工業生產尤爲重視，而產業工人則成爲該國公民中的中心人物。在經濟方面，以工業爲一切生產事業中之最重要的部份。工廠的組織與管理方法爲其他一切機關的模範，即蘇維埃政府機關亦不例外。農業生產發達的極點，就是要使之工業化，使農業與工業間的異點漸歸消滅。現在蘇維埃國營農場，已具有工廠性質。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天增加一天。該國人士的信念就是：工業爲百業的根本，必須使工業發達纔能有機器供給農業，纔能使運輸與交通的工具日益進步，纔能使一切教育與文化事業得到充分的物質基礎。工廠裏的組織，認爲是最合理的社會組織，和與生產技術的組織。工廠裏的生活能訓練出有勞動習慣，不自私，和堅決而爽直的工人。按該國當局的計劃，在未來的社會中，階級的分歧將漸歸完全消滅，因之政治的組織亦逐漸消失，社會上的經濟組織日益重要，而以工廠爲一切經濟組織的中心，工廠裏的生活就成爲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成份。所以在社會方面，以工人爲全體人民的模範，彷彿工人具有一種標

準的人格，而此種人格必須在現代的工廠中纔能訓練出來。因之，各級教育機關都有工廠實習，這種工廠實習，在蘇聯稱爲『生產實習』。不僅學習電機、機械、土木、應用化學等技術科的學生要到工廠裏實習，即學政治經濟與任何社會科學的學生亦必須有相當時間的工廠實習。凡派到工廠實習的學生，均完全過工人的生活，參加工人的各種會議與一切社會活動。他們所實習的，不僅在生產的技術方面，而尤其是在生活習慣方面，要使青年學子接近工人生活，並在實際的參加中了解工人生活。

工人在蘇聯固已一般地加以重視，而『在業工人』尤爲各界人士所推崇。這與上述一般的公民觀念有密切聯繫。因爲所謂『從事生產的公民』如果脫離生產事業已久，則在生活上亦有腐化的可能，所以公民必須現在『從事』於生產。在業工人被認爲是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公民，以蘇聯最通行的術語來說，他就是站在社會主義建設最前線的『戰士』。他在政治上與社會生活上都享有特殊的權利，其他團體或個人的錯誤，時常要請在業工人來糾正。這樣推崇在業工人與一般的工人份子，是蘇聯立國的基本原則，從這個基本原則上推出種種公民組織、訓練與教育的方法及其具體的形式。

蘇聯公民訓練的組織如蜘蛛網一樣，分佈得非常周密。每個公民至少參加二三種公民組織，有些公民參加到十餘種組織之多。加入一種組織，就領得一個會員證。公民本身亦須向政府機關註冊，領得公民證。無論到什麼機關，或參加集會，甚至進入遊戲場，均須攜帶本人的證件，方可入內。所以蘇聯沒有一個散漫而無組織的公民。公

民訓練工作之所以能夠深入並能獲得良好成績，端賴這樣周密的組織網。

蘇維埃政府機關本身即含有公民訓練的意義。『蘇維埃』意即代表會議，在這裏主持行政工作的人員無非是人民的代表。他們與其他各國的官吏不同，並認為『官吏』這一名詞是對他們的侮辱。因為在蘇維埃機關裏時常作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若稱他們為官吏，等於說他們是官僚，就是說他們沒有代表民衆的資格。除了少數常駐的工作人員以外，蘇維埃的代表仍在繼續他們在工廠或農場裏的固有職業。這些代表時常改選，藉以吸收許多新的份子，可使民衆都有被選到蘇維埃，以作政治上實習的機會。蘇聯的政治領袖們常說：『勞動者應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意即他們應被選到政府機關作行政的實習。每次蘇維埃改選所標榜的政策，都是多提拔新的工作人員。往往知識很低而能盡職的勞動者被提拔到蘇維埃機關，成為政府的行政人員，使他或她練習管理這國家的機器。所以說蘇維埃本身便是一種公民訓練的機關，並非虛語。

在本書中特別舉出而自成一章的職工會與合作社，可說是蘇聯國內最廣大與最基本的公民訓練的必需組織。若說蘇維埃是政治的組織，則職工會與合作社是經濟的和文化的組織。職工會所負的任務是：促進各機關的生產效率，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水準，滿足會員的物質要求，保護他們各種切身的利益，等等。合作社所負的任務是：以集體的原則促進生產與節省耗費，調節生活必需品的流通，滿足勞動者的需要，等等。兩者都以集體主義訓練公民，使一般民衆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到集體主義勝於個人主義，漸漸引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

職工會，稱爲『共產主義的學校』，對於勞動者的生活領導無微不至；勞動者且以此監督本地的行政機關，並進而糾正政府的缺點。所以正確地說來，這兩種組織都具有政治性質，而職工會的政治性質更爲濃厚。蘇聯的職工會是職工國際組織的屬員，所以該會對於會員，尙有國際主義的訓練。這兩種組織包羅羣衆最多，而與社員或會員的切身利益極有關係；以此種組織作公民訓練的場所，其收效之大，自在意料中。

蘇聯的城市居民，差不多全體是合作社的社員。除了幾處國營的大商場以外，自各大城市以至窮鄉僻壤所有的商業機關，可說完全是合作商店。合作社社員到商店裏購買物品，可以折扣，而且有些物品非社員不能購買。工人社員則更爲優待，他們非但可以得到特別廉價的東西，且可購得大量生活必需品。在這種優待辦法裏，寓有很重要的公民訓練意義，使一般人民自然地趨向於集體主義，並願自己成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人。

鄉村的農民向來經營其個人主義的小農經濟，他們的生產品很少到市場上出賣，而且他們的生活必需品之仰給於市場者不像城市居民之多，所以集體主義很難爲他們所接受。當本書作者最後一次到蘇聯考察時（一九二六年），該國農民仍在過着很守舊的生活；所以本書對於鄉村的公民組織，祇能說些農民互助會與鄉村會議等組織，這類組織可以說是歷史上的陳跡了。自第一屆五年計劃完成以後，蘇聯的農村已起了根本的變化。集體主義已在鄉村獲得驚人的成績。現在鄉村農民的個人經濟幾近絕跡，百分之九十農民都已加入集體農場。集體農場運動（collective movement）成爲農村中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且可說是全國最重要的公民活動之一。

集體農民（即加入集體農場的農民）被認為是『鄉村社會主義的柱石。』他們有全國代表大會的組織，對於農產品的增加，農業的機器化，與全部國民經濟的進步，以及人民團結的鞏固，都有絕大的功績。

集體農場的原始形式是農民耕種互助社（Societie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Agriculture）。這是一種農民自動組織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因感自己耕種器具的不齊備，彼此互通有無，組成耕種互助社，把社員的牲畜與農具聚在一處，共同享用，共同耕耘，而所得農產品仍各自分開，不相混同。在起初時，互助社祇在農忙季節作這樣的合作，而平時則仍把牲畜與農具分開，歸原主保存，而依然各營其個人經濟。但自此種試驗見出成績之後，農民漸漸放棄其個人經濟，羣起加入耕種互助社，且不願再行分離。這些互助社因此日益鞏固而具永久性，遂蛻化而為集體農場。許多集體農場，非但農具公有，而且農產品亦歸公有。此種組織依其成員的志願，可有很大的伸縮性，其最高度的發展形式，便是公社（commune），在這種組織裏集體農民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完全出於自願，如有不合意，隨時可以退出。當集體農場運動發展的初期（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農民的情緒游移不定，加入與退出的都是很多，有如潮水漲退一般。後來終為實際的利益所信服，退出的現象頓形消滅。至一九三一年，過半數農民已加入集體農場，農村經濟的集體化運動，成為普遍的公民活動。自此以後，鄉間舊有的農民組織漸歸消滅，而以集體農民的組織代替之。集體農場就成為鄉村一切經濟、文化與整個公民活動的中心。本書以根據較早時期的材料，對此極重要的農民集體化運動，未能與對職工運動及合

作運動同樣地加以充分敘述，不免稍有遺憾。

集體農場所以有今日的成績，可說是工農聯合的結果。城市工業以大量新式的機器供給集體農場，使牠們握有曳引機(tractor)與複式收穫機(combine)等最進步的生產工具，藉以提高農業生產率，並增加農民的收入至數倍之多。此等機器非個別農民所能置辦，要應用這些機器，必須有大規模的經濟組織。故農民雖富於保守性，終於見利而趨，願拋棄其向來的個人經濟，而進行集體的生產方法。但此種集體的經濟組織，農民素無經驗，若沒有城市工人的幫助，集體農場亦難見諸實行。所以隨着集體農場的發展，蘇聯有大批工人從城市裏派到鄉村，將他們在工廠裏所得的經驗搬到鄉村，而成為農民的直接幫助者。集體農場在此物力與人力的援助之下，就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迅速成功（第一屆五年計劃在農村經濟集體化方面祇兩年即已完成。）自此以後，工農的聯合愈加鞏固，而且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放棄私產觀念，他與工人間的矛盾亦無形消滅。工農的聯合，因此愈加鞏固。

當革命的初期，蘇聯鄉村祇有幾個少數的國營農場，以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作為農村經濟的模範。但農民本其平素的習慣，各營個人經濟，以致農村的階級分化依然難免，而農民對於國家的經濟建設亦無若何積極的幫助。曾有少數領袖認農民為反動份子，主張加以壓迫。其他領袖則堅持聯合全體農民（意即聯合中農與貧農，）而以審慎的態度對付農民羣衆，於是當局者內部發生劇烈的爭論。約當一九二四年，又有一番爭論，前者主張用

強迫的方法使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者則認為彼時客觀條件尚未成熟，不能組織集體農場，而強令農民加入。到了一九二八年，後者纔策進農村的集體化運動，但依然反對採取任何強迫的方法，當時仍有不少人員徒求速效，以致在實施中忽視教育方法，而趨於強迫之一途。其結果遂使許多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如潮漲一般地蜂擁而入，不久後又如潮退一般地相率而去。自當局改正一切強迫的方法並對農民作多方的教育後，集體農場纔得真正的發展，所以集體農場運動實含有重大的公民教育意義。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還有下列幾種特殊的公民團體：

第一，扶護社：這種組織是多方面的，有工人對農民的扶護，青年對幼童的扶護，行政機關對政治落後團體的扶護，教育機關對文化落後團體的扶護，等等。這種扶護的性質，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凡在任一方面較有能力的團體，都應組織扶護社來幫助在這方面較弱的團體。甚至工廠的工人可以組織扶護社來扶護蘇維埃政府機關，助其肅清官僚主義。這種扶護工作是蘇聯公民最重要的社會服務之一，對於該國的文化革命與經濟發展都有極大幫助。

第二，肅清文盲社：革命前的俄國，不識字的人民佔了很大的百分比；因此，肅清文盲成為革命後特殊繁重的工作。凡學校的師生與各機關的職員，都隨處組織肅清文盲社，以本機關的識字者來教不識字的下級職員讀與寫。不論人數多少都可開班，每日於工作之暇，作一二小時的學習。這種公民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服務，教者

完全是義務職，社員的加入都是出於自願，且不繳納任何社費。但這種組織可說已成過去，現在蘇聯已沒有不識字的人民。

第三，工農婦女代表會：在革命前，俄國婦女與中國婦女相似，頗受壓迫，無論在知識與能力上都比男子弱得多。在蘇維埃制度下，認為勞動婦女有特別組織的必要，使她們可在這種組織中爲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奮鬥，設法提高她們的經濟地位，文化水準，以及政治的認識。這種婦女代表會完全是公民訓練的組織，代表於會議中討論自己切身問題以後，即組織政治常識班，各種研究組，參觀隊等等，以進行自身的教育工作。

第四，航空化學會：這是一種國防的民衆組織，在其會員的普遍與工作的性質上都與上述三種組織不同。在蘇聯一切機關裏都有這種組織。會員須繳納相當的會費，並領有會員證。該會的宗旨是動員民衆的力量促進航空事業發展，並授會員以防空與防毒氣的知識。蘇聯城市居民，賴這種團體的活動，都已學得能運用防毒面具與避免飛機的轟炸。這種團體的設備與其指導的人才，得軍事機關的幫助甚多。蘇聯飛機的數目現居世界列強首位，成爲空軍實力最雄厚的國家，其得力於這種公民的組織者，實不在少。

第五，國際革命者互濟會：這又是另具一種特殊性質的公民組織。顧名思義，即知其爲範圍更廣的並含有政治與慈善性質的國際組織。這種團體也與航空化學會一樣地普遍設立於全國各工廠，學校，與一切經濟的與文化的機關。會員須繳相當會費，並於必要時舉行募捐以救濟各國的革命者。該會對各國革命的逃亡者招待得非

常慇懃。會員時常與世界的革命事件及其參加者發生接觸，並對世界弱小民族與被壓迫者的革命運動表示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參加這種組織者有各國的老革命黨員，例如法國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參加者亦有加入這個組織。

以上五種團體都是較重要的公民組織，使人民在這些團體裏的活動中養成自強不息的精神，互助的習慣，與團結的能力，而且對於國民經濟的建設，文化的發展，與國防的鞏固，都有莫大的輔助。本書對於這些組織都予以詳盡的敘述。其他還有不少次要的組織，如反宗教的團體等，則有時附帶述及，略而不詳。

一切這些團體都是自願的，羣衆的，非政府與黨的組織。他們的組織完全獨立，但在思想上受該國唯一合法的政黨——共產黨——的領導。該黨黨員自稱是人民的先鋒，對公民羣衆的一切活動，或居倡導的地位，或出全力予以扶助。該黨在一切公民團體裏都派有重要的工作人員，以執行黨在各方面的政治路線。各種公民活動的領導與公民訓練的方針，都在黨內作經常的討論，並對各種工作成績加以檢討。所以該黨實爲蘇聯公民訓練的領導者。凡成年的積極工人與農民以及各界的先進份子都加入該黨。青年工人、農民、學生及各機關的職員中之先進份子，則加入共產青年團。在同一系統之下的兒童組織，則爲兒童先鋒隊。更幼的兒童，則爲十月革命兒的成員。這是一個按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黨的組織。嚴格地說來，他們認爲祇有共產黨是政黨，自共產青年團以下都是羣衆的組織，說牠們是公民訓練的基本組織，亦無不可。不過這些組織與黨的關係更爲密切，而且彼此

在組織上有連續的關係。年齡較長的十月革命兒可同時加入兒童先鋒隊，較年長的兒童先鋒可同時加入共產青年團，而較年長的共產青年亦可同時加入共產黨。所以黨的政治影響可以直接由兼黨的團員傳達到青年團，並再經這個連續關係而一直傳達到兒童的組織。這些組織各在其年齡相似的全體人民中起領導的作用。本書共有三章專述這些團體的組織狀況、發展情形與領導方式。這在本書中所佔的篇幅與牠們在蘇聯公民訓練上所站的地位頗相適合。

蘇聯公民訓練，除上述各種組織以外，還有種種工具與方法。

各種定期刊物、報紙與小冊，都是公民訓練的無上工具。黨與政府的中央機關報，除登載國內外的重要消息外，把日常重要的經濟建設問題與政治問題，以很大的篇幅提示於讀者面前。各機關工作的優劣點之具普遍意義者，都按實際情形在報上批露，分別加以言論上的獎勵與警誡。這對於民衆起很大的教育作用。各省市另有其地方的報紙，對於本地的經濟與政治等消息多加記載，但其一般方針仍與中央機關報一致，此外，工人有工人報，農民有農民報，紅軍有紅星報：這些是適應每一種公民範疇的需要之日報。其他局部的小報，種數甚多，每一大工廠，或蘇維埃國營農場，都出版一種報紙。其他較小的工廠農村與一切機關，都定期出版一種壁報。這些小報或壁報都能把本機關或本地方的生活反映出來，並為這部份公民的組織者與領導者。蘇聯的報紙都沒有營業性質，而是民衆的宣傳者與組織者。該國報紙種類的繁多與銷數的廣大，為世界各國所未有。其在公民訓練上所起作

之偉大，於此可想而知，本書對於這種蘇維埃的出版物，亦有專章論述。

在文化與思想方面的公民訓練，時常寓於娛樂中；因此，文藝、戲劇、電影、音樂、無線電等，均成爲公民訓練的工具。聽戲、看電影、遊公園等娛樂，在蘇聯認爲是勞動者應有的文化生活，與其物質生活有同樣的重要性。政府不惜以鉅資建立很多劇場、電影院、博物館、文化公園、俱樂部等娛樂場所，以滿足勞動大眾的需要（據一九三七年度計劃，應開辦新劇場九所，電影院五十六所，裝設電影機五九四五架。）常有各工廠的工人，或鄉村的農民，組織集團的參觀、遊覽、聽戲、看電影等等。這些工作的組織者是各機關的俱樂部管理員或在本地任文化工作的人員。

俱樂部在蘇聯起很大的作用，其設立的普遍，亦爲世界上所罕見。牠不僅是娛樂的場所，而且是領導文化生活的機關。每一工廠或其他機關，凡人數在幾百以上的，都有一個俱樂部，負組織本機關勞動者的文化生活之責。或出外參觀、看戲、看電影等等，或自行組織晚會、音樂會、體育表演等等。較小的機關，則設立同樣性質而規模較小的紅色處（The Red Corner），在這裏設備一些有益身心的消遣東西，如運動器具、樂器、小說、詩歌之類。蘇聯每一機關、村莊、軍營、船艘，都至少有這樣的設備。

附設於各機關內而成爲最普遍的公民教育方式的，則爲各種研究組。有戲劇、音樂、文藝、繪畫、無線電、政治現勢、社會科學、軍事常識等研究組，均由當地的勞動者自由加入，聘請專家指導。這些專家亦以指導研究組爲他們應盡的公民義務。學校學生、機關職員、工廠工人、集體農民等，都興高彩烈地於其正常工作之暇加入這些研究組，

以作業餘的研究。這些組織成爲人民提高文化水準與增進科學、軍事、政治等常識之有力的工具。

一切這些公民教育的方法與其所採取的形式，都是在學校的正常教育以外於全國最廣大的民衆間進行。至於蘇聯的學校，則更是計劃周詳並具有一元系統的組織。該國教育制度的特點，首先爲一切學校都是勞動者的學校，而工人與貧農的子弟特別得到優待。其第二特點爲對於政治教育的重視，任何學校都有其最低限度的政治課程，並時常舉行政治講演，而學生對於政治的認識亦爲學校當局經常關心的一點。其第三特點爲在學科上重視應用科學及各種生產技術的訓練，除了專門的政治學校（即所謂蘇維埃黨校及其產主義大學）外，大多數學校都是技術的學校，而中小學的課程分配亦以自然科學的比數居多。在該國內部階級矛盾逐漸消滅的過程中，自然科學的比重日益增加。其最後特點則爲學校教育與實際的生產過程密切聯繫，此點已在上面敘述工廠實習時言及。學校與學生的數量及其增多的趨勢，尤足驚人。計去年（一九三六年）小學及中學學生人數共達二七、四一八、〇〇〇，今年且要增至三〇、〇三三、〇〇〇名。幼稚園兒童人數去年爲一、〇三〇、〇〇〇，今年將增至一、二七九、〇〇〇名。又在今年的計劃中，要在各城市增設新辦學校九百三十所，添收學生五二八、〇〇〇名。讀者若能以這些數字與本書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以前所得的相當數字作一比較，則對其進展的迅速便可一目瞭然。

圖書館與讀書室亦隨着民衆文化水準的提高有加無已。每一學校，每一工廠，每一集體農場，每一政治的、經